

本报记者 黄玮

深刻体验人生的阔达

周末周刊: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书名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群魔》中列比亚德金的话:“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。在我们干净的时候,倒无需关注。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,是人皆爱的。”您在书中写道,这句话使您“在十年故事的迷茫中,找到了进入灵魂的入口”。

陈建功:这本书,其实早在1995年我就想动笔了,当时拟定的题目是《十八岁面对侏罗纪》。之所以取这个名字,是因为1968年,我十八岁高中毕业到了京西木城涧煤矿挖煤。那里的煤层据说形成于石炭二叠纪和侏罗纪之间。

但我后来忙于行政事务,这个写作计划便被搁置了。时光匆匆而过。如今再拾起笔,若还沿用《十八岁面对侏罗纪》这个题目,未免有些浅显了。毕竟,“青春面对苍凉”这类主题已被很多人写过,再重复很难出新意。于是,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在煤矿十年的经历与思考。

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那个特殊年代中挣扎过来的,我们的思想受过禁锢,也多少遭遇过不公。在我28岁时,那种挣脱束缚的畅快曾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,包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。可回过头来看,才发觉那时我们的内心仍难免被从众的惯性、庸俗化的激情所羁绊。因此,我一直想找一种更为准确的调子,来描摹当年那种复杂的心态。

直到后来,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读到了小人物列比亚德金的这句话。我忽然心头一震:当年挖煤的那些日子,尘埃弥漫,煤灰满脸,何尝不是“脏”的时候?就让我步入文坛的动机,也不过是为了改变一个“卑微的自己”,何以面对文学的高贵?

周末周刊:那种日子的困顿与沉重,一下子被这话点透了。

陈建功:和当时不少青年作者一样,我最初的作品,不过是为了“混公出”,少下几天井,渐渐觉得自己还可以写应时的报道乃至应时的小说,渐渐发觉这甚至可以拯救卑微的自己。这便是我文学之路的起点。

但时代的改变使我明白,拯救卑微的自己,或许能成为文学的起点,却不能锻造文学的高贵。文学的高贵,来自心灵真诚的呼唤,来自关于人和人性的深刻思考,甚至来自某种时代的反省与抉择。列比亚德金的话,使我真切地找到了叙述那十年青春的“腔调”,这使得这次写作愈发走向真诚的反思,在反思中寻找灵魂的出口。

周末周刊:“头一次下井,坐在一列长长的煤罐车里向巷道的深处驰骋。大家安全帽上的矿灯,组成一条闪闪的光带,宛如一条长龙游入苍茫星海……”在文字里读出了您那时的震撼。您在煤矿抡锤打眼,开山凿洞,与工友相濡以沫、嬉笑怒骂,甚至腰还被矿车撞折过……这段风尘仆仆的劳动岁月,构成了您感悟“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”的现实土壤。

陈建功:是的,十年矿工,让我深刻体验了一种人生的阔达。矿工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群体,他们豪爽、义气,生死相依。他们有一种独特的把握生活的审美——似乎总是用一种“喜剧”的心态对待“悲剧”的人生。较之旧煤窑,新中国矿工的工作和生活当然有了天壤之别,但工作仍然是有危险存在的,生活也殊为不易。不过,他们的生活洋溢着“喜剧”的态度,把“悲剧”拆解成日常笑谈,这种苦中求乐的生活法儿,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熏陶了我,慢慢也成了我感知世界、领悟人生的方式。

与这帮家伙相处,不仅可以感受到生活百味,而且可以把委屈、抑郁、屈辱和愤懑都化作尊严的一笑。我自认为是他们重塑了我对人生的理解,甚至提供了一种审美的把握。

低入尘埃的分享

周末周刊:许多年过去,当您提笔书写那段岁月时,说自己是“低入尘埃,和大家分享尘埃中那青春的滋味”。从亲历的“尘埃”到分享的“滋味”,其中有着怎样的审视、选择与文学重构?

陈建功:提笔写当年岁月,如果对生活没有新的思考,审美上找不到独特的角度,这样的文学缺乏灵魂,也缺乏趣味。文学这东西,既要求真诚,也要求你调皮,要求你特立独行,别开生面,还不能“装”,必须真实地袒露自己。因此,我觉得我写这部书不能用“精神教主”的姿态来写。就像我在书里说的,既不言“青春无悔”,也不说“青春有悔”,只能说那煤矿的巷道给了我青春的滋味。

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有经历的人生是幸运的,就和拥有有学问的人生何等自豪一样。但我觉得,并不因为我们曾经这样经历过,或你有那么大的学问,就有胆量傲气逼人地给今天的青年人煲“心灵鸡汤”。所以在书写时,为了贴近真实的生命体验,为了

文化风采

陈建功:无可替代的“哆嗦”

著名作家陈建功的非虚构新作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,不仅是对自己十年煤矿岁月的回望与审视,更是对文学初心的叩问。

在陈建功看来,一部作品写完时,作家“躲在被窝里的浑身哆嗦”是AI永远替代不了的。因为,这哆嗦源于生命经验的淬炼、人性深处的自省,以及文字落地时有血有肉的真实与激情。



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
陈建功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在江西泸溪河畔



陈建功

1949年11月生于广西北海,1957年移居北京。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兼作家出版社社长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,全国政协委员、常委。主要作品有长篇非虚构小说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、长篇小说《皇城根》(合作)、小说集《迷乱的星空》《丹凤眼》《找乐》《鬈毛》等。

周解
末文

份“低入尘埃”的分享,我改了一遍又一遍,只为找到一种平等的传递。

周末周刊:您的“青春的滋味”是怎样的滋味?

陈建功:是融入大时代洪流又品咂个性的滋味,是自命“草根”又希冀跳脱开去把玩审度的滋味,是嬉笑又暗暗落泪自省的滋味。那是大时代背景下个体命运的浮沉,也是底层百姓藏在日常里的欢乐与忧伤。

周末周刊:1978年,煤矿十年经历之后,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当您带着井下十年的记忆与感受坐在中文系的课堂时,是否感受到某种碰撞?

陈建功:在当年的北大,让我最强烈地感受到是一种质疑的精神。比如,洪子诚老师就说过,既做了中文系的学生,就不能只满足于那些可以“一言蔽之”的口号,比如“文学来源于生活”。你得知道文学既是客观世界的反映,也是主体的感悟。文学当然来源于生活,但更是创作主体的感悟,是你把这些真切的感受加上自己的生命经验、人生思考融合起来,为读者铸造的文学世界。回忆起来,这些或许属于创作论的常识,但这种对既成言说的质疑、追问和补充,不能不说对我有着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启迪。

周末周刊:在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,与许多作家、编辑结缘,形成了一个彼此滋养、十分热闹的“文学朋友圈”。

陈建功:1995年,我从北京作家协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,任创作研究部主任。恰逢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在上海召开,由巴金先生主持,增补包括我在内的4人进书记处,负责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,让我担任起草会议的决议。

保有“认同的危机感”

周末周刊:作家草明是您文学路上的第一位恩师。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《铁扁担》的手稿,就是1973年您向草明讨教时特意认真誊抄的那份。

陈建功:我得承认那篇小说的稚嫩和对于文学理解的肤浅,但它的故事的确令我感动。当年北京召集重要厂矿的业余作者创作出版一本工矿题材小说集,我是其中一员。这本书的责编李炬老师很用心,请了工业题材创作领域的作家、刚刚被“解放”出来的草明老师为我们指导。李炬老师让我们把自己的作品认真誊抄一遍。我誊抄后送过去的,就是《铁扁担》上任。

当时,草明老师家那局促的客厅,被我们几个来自工矿的业余作者挤得满满当当。草明老师毫无架子,一篇篇给我们分析,讲到我的稿子时,她给了我不少鼓励,还问我怎么积累了这么多有趣的语言。我回答说,大概因为挖煤的人都爱苦中作乐吧。草明老师说,她到工人中间去的时候,也感受过他们的语言,是很新鲜有趣的。

多年后,这份手稿居然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,说来颇具戏剧性。有一天,一位青年文学研究者告诉我,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看到了我的《“铁扁担”上任》的誊写稿,捐赠人叫吴纳嘉。我立刻想起,那就是1973年我登门求教时特别认真誊抄的那份。真没想到,老师竟然将这份稚嫩的文稿保留到辞世,而后由她女儿吴纳嘉捐赠给了文学馆。

周末周刊:在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,与许多作家、编辑结缘,形成了一个彼此滋养、十分热闹的“文学朋友圈”。

陈建功:1995年,我从北京作家协

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,任创作研究部主任。恰逢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在上海召开,由巴金先生主持,增补包括我在内的4人进书记处,负责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,让我担任起草会议的决议。

周末周刊:与作家们交往的过程中,还有哪些情景与人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?

陈建功:前两天我去海南,踏上那片土地,就立刻想起了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情景。当时是南京《钟山》杂志邀请我们去的,让我开心的是,他们居然把史铁生也请来了。记得我们参观潜水艇,潜水艇的舱门很小,铁生的轮椅进不去。那时还是小伙子的苏童,二话不说,背起铁生钻进了舱门。这画面,成了我这次又到海南时最美好的回忆之一。

周末周刊:与作家们交往的过程中,还有哪些情景与人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?

陈建功:前两天我去海南,踏上那片土地,就立刻想起了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情景。当时是南京《钟山》杂志邀请我们去的,让我开心的是,他们居然把史铁生也请来了。记得我们参观潜水艇,潜水艇的舱门很小,铁生的轮椅进不去。那时还是小伙子的苏童,二话不说,背起铁生钻进了舱门。这画面,成了我这次又到海南时最美好的回忆之一。

周末周刊:我见到了韩少功,和他聊起1995年组织上要调我去中国作协做行政工作,我很犹豫。我本来是专业作家,干吗去做行政工作?这个时候,我收到了少功的一封信。他在信里说起自己从湖南到海南的缘由:当了几十年专业作家,忽然觉得该去海南经历些新的东西,免得老年时回忆起来太过枯燥。那封信现在还在我家。

我说,是少功的这句话点醒了我。是啊,不妨暂时放下专业作家的身份,去体验一番,多些不同的人生经历,让老人的回忆不至于太过枯燥。

周末周刊:这个“点醒”似乎不只影响了您当时的决定,也指向了一种更深层的文学态度。

陈建功:是的。今年,在少功的《理想,还需要什么——韩少功谈话录》新书发布会上,我说,从少功身上我认识到——作为一个作家,要时时保有“认同的危机感”。思想也好,艺术也好,乃至对既成的惯以为常的言说方式,都不能不产生“认同的危机”,这样才能走出新的情感境界,开拓新的艺术天地。

周末周刊:在您所经历的漫长文学

时光里,有哪些时刻让您深深体悟到文学的魅力?

陈建功: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,当时的文学氛围纯粹而迷人。我们隔三岔五就往时居北京的作家苏炜住处跑,聚在那儿探讨文学。有时,我们走到大街上还争论不休,渴了就买个西瓜,摔碎了人一块,坐在路边一边吃西瓜一边继续热烈朝天地讨论。

记得我写《鬈毛》,写到后半夜,越写越兴奋,干脆骑上自行车,穿过半个北京城去找作家郑万隆,拉着他聊。

那时候也有文学评奖,但几乎没有人为获奖去说情。我记得,史铁生的小说《我的丁一之旅》入围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终评,当时我在作协主管评奖工作,我们在评奖期间见过无数次,他却从没提过一句自己作品参评的事。后来他没获奖,我也照样毫无愧色地进出他家。那时大家都更看重通过作品来抒发自己心底的真感情,构筑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,这份纯粹,至今想来仍觉珍贵。

“平民北京”的文化启迪

周末周刊:您出生于广西北海,发蒙即移居北京,这座古都的传统民俗、市井生活、人情世故,以及北京人特有的幽默与宽容滋养了您的创作,催生了《辘轳把儿胡同九号》《鬈毛》《放生》等“新京味小说”。

陈建功:我一到北京,不仅天气冷得让我不适,更处处有文化上的冲击。北京家里没有洗澡的地方,父亲带我去公共澡堂,满屋子的人赤裸相对,吓得我撒腿就跑。在广西我们习惯一人一间冲凉房。那算是我最早的“文化震惊”。后来,更是进一步感受到各种文化上的差异与融合。这种“文化震惊”,带给我关于北京文化的独特体悟。

周末周刊:有人这样评价:陈建功“比谁都懂老北京,比谁都能品出这在北京人世俗日子里的滋味……这些老北京的美食之前不知有多少人写过,可他写的就那么让人爱读,因为他有自己独特的细节和感悟”。在您看来,京味

是怎样一种精神质地?

陈建功:我曾经说过,北京的滋味儿在庙堂之高,也在胡同之深;在官宦之显,也在平民之乐;在历史的积淀,也在当下的开拓。缤纷斑斓,深邃无涯。京味有不同的表现形态,但若论其精神质地,我想就是它既承载着中国人共通的文化品格与美学神韵,又沉淀了北京城独特的地域文化。

周末周刊:在都市急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,“新京味”新在哪里?

陈建功:一代作家对京味的理解和表达,大家都是在北京的文化背景下去寻找各自的突破,这种不同与突破形成了京味的“新”。

周末周刊:您的朋友李舫写道:陈建功的敏锐和宽厚,“来自早年命运多舛的磨炼,来自百年传承的北大精神的熏陶,也来自‘平民北京’的文化启迪”。这三种力量,是否也塑造了您看待世界与书写世界的独特目光?

陈建功:是的。或可承认,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精神的土壤——命运教我以喜剧面对悲剧,北大教我质疑的精神,而北京文化是我长期的真实生活的依托。

被窝里哆嗦了半小时

周末周刊:1978年,读到卢新华的小说《伤痕》忽然使您明白,“文学,最应该拷问的,是心灵的诚实”。这是否成为您一生相信并坚持的文学信条?

陈建功:那时,我已经发表了几篇作品,上海电影制片厂让我和林洪桐去上海赶一部电影剧本。1978年的8月11日,晚饭后我独自走在永福路上,在报摊上买了份《文汇报》,在上面读到了卢新华的小说《伤痕》。

《伤痕》把我的上海之行变成了一次涅槃之旅。那一晚,我彻夜未眠。它忽然使我明白,文学,最应该拷问的是心灵的诚实。于是,我放弃了在上海写电影剧本,回到北大读书,写了《丹凤眼》和《京西有个骚达子》等。因此我说历史转折是一所伟大的学校,它让我认识了自己,读懂了人生,也渐渐想透了什么是文学。直到今天,我写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,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诚实。

周末周刊:创作此书您还坚持了另一个原则——有趣。您所追求的“有趣”指向什么?

陈建功:就是希望把中文的魅力展现得有声有色,这才是中国文学该有的味道。

举个例子。有一回,我去翻译家施咸荣家里,他正忙着翻译理查德·赖特的《土生子》。他留我吃饭,从冰箱里拿酒的时候,忽然问我:“假如你是没什么文化的女主人,你打开冰箱发现灯坏了,会怎么跟我说?请告诉我老百姓最直白的说法。”我说:“给个亮!”他说:“哎呀,太好了!我憋了好几天,就想找这么句话。”他说:“施先生当然是谦虚,但我懂他的意思:提炼过的日常语言是最生动有趣、最有生命力的,也是文学创作要汲取的养分。”

我所说的文学的“有趣”,就是希望文学让读者在作品的艺术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沉浸,获得享受。这种感受要来自自然生长,是单靠炫技所达不到的。

周末周刊:由此我想到了当下的一个文学现象:文学创作的边界被不断拓宽,这包括了题材的多样和作者队伍的拓展。快递员、工人、司机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纷纷成为文学现场中新的书写者,新大众文艺的生态因此而蓬勃。

陈建功:这是令人欣喜的。文学需要来自生活深处的、带着鲜活生命体验和心理温度的表达。在草根中成长起来的作者,往往拥有扎实的生活感受和真实的人生辛酸,这是他们独特的财富。但这还不够。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,都需要在文学道路上持续提升,努力追求作品能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感染力。这不只是某一个作家的事,而是整个文学进程的一部分。中国文学要攀登新的高峰,需要这样的力量。

周末周刊:您认为文学的分享就是分享情感的滋味。在这个AI开始写作的时代,这是否正是文学最不可替代的价值?

陈建功:AI给文学带来了惶恐。据说已有作家或全部或部分借助AI,写出了历史小说、科幻小说,并摘取了文学奖项。AI时代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。今天,一个作家应该如何放下传统的执念,融入新的文化形态?我想,作家和大众文化形态的结合、和AI时代传播方式的结合,绝不仅是找一个新饭碗的问题,而是一种崭新的融入,一种与新时代人民情感方式的融入,一种即时可感的艺术表现力的借鉴。

但我也相信,文学创作的本质,就是作家人生的分享。文学,最终是作家为他的读者重新铸造的一个世界。无论AI怎么发展,它永远难以算出一个由阅历、情感与美学共同熔铸的文学形象。我告诉你,我写完这本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后,躲在被窝里浑身哆嗦了整整半小时。你或可理解那种感觉?

我总算把心里憋着的话、想写的人物和故事,全都掏出来了。那种前所未有的激动,让我躲在被窝里控制不住地哆嗦。我想,对作家来说,这种“躲在被窝里的哆嗦”是AI永远替代不了的。因为有了这哆嗦,作家永远不会失去创作的自信与幸福。



当矿工时的陈建功(左六)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